

出土钱币窖藏所见宋辽货币经济交流

李志鹏

内容提要:辽国建立之后,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与宋朝相敌对,但在经济和文化上却对宋朝具有极强的依附性。通过对各地出土窖藏钱币的研究得知:北宋钱币数量居多,占窖藏总钱币数量的70%以上;唐代钱币次之,约占窖藏总钱币的20%;辽国钱币数量稀少,少则数枚,多则几十、数百枚。辽国虽然铸造代表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宋钱和其他中原王朝钱币仍是其商品流通中发挥主要交换媒介职能的货币。为满足对于货币的不竭需求,辽国一方面颁布律令严禁铜钱资源外流,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往来等手段争取更多的铜钱流入。在同一货币纽带的牵连下,宋辽双方经济交往非常密切。

关键词:钱币窖藏 宋钱 辽钱 贸易往来 货币交流

一、选题缘起

辽国(916—1125)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立都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历时210年,^①其版图包括今东三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新疆以及今俄罗斯、蒙古国的部分地域。辽国的契丹和奚人最初繁衍生息于辽河上游的潢水、土河流域的森林中,从事以游猎、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随着契丹社会的快速发展,至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时期,辽国国势日趋强盛,疆域逐渐扩大,展开了向西拓展疆土的军事征伐活动,并积极经略西疆,^②其声威远及西亚乃至更远,草原丝绸之路再度兴盛。^③由此而来,辽国从最初的辽河上游扩展至华北平原燕山地区,成为囊括长城内外、雄踞草原、幅员万里的大国,^④并且形成以奴隶制、农奴制相结合的经济体系。畜牧业在契丹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养马,马的多少成为衡量契丹诸阶级阶层的一个重要标志。^⑤随着国力逐渐强盛,农业、手工业、商业在契丹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人口、生产亦得到不小发展。“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⑥以五京为中心的繁荣商业区经营各种行业,并进行商品交换活动。^⑦

早在立国之前,契丹就开始冶铜铸钱。建国后,契丹和辽国的货币经济发展更是成绩卓著、灿然可观。^⑧辽国铸造有代表本民族政权的各种年号和非年号钱币,形制受唐及五代影响。太祖阿保机父

[作者简介] 李志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兰州,730700,邮箱:857194750@qq.com。

①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② 杨富学、邓浩:《略论辽朝的西域经略》,《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4期。

③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页。

④ 参见《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7页。

⑤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58页。

⑥ [宋]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靖康稗史之一·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17页。

⑦ 李侠、晓峰编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⑧ 周锦章、田广林:《草原丝路和契丹货币经济》,《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2期。

“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到太宗耶律德光时，“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①后于五京及长春州（吉林白城东）、辽西（辽宁锦州北）、平州（河北卢龙）等路置钱帛司，总管铸钱和钱币流通。^②然而，限于铜产量严重不足，年额有时不过500贯，^③契丹政权尽管鼓铸钱币，但很难满足流通的实际需要，其质量也不够好。

为了解决通货不足，辽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严禁销毁铜钱铸造器物和外流，如重熙元年（1032）颁布法令：“先是，南京三司销钱作器皿三斤，持钱出南京十贯，及盗遗火家物五贯者处死；至是，铜逾三斤，持钱及所盗物二十贯以上处死”。^④二是通过贸易等途径大量吸纳宋钱入境，以缓解辽国上下对于货币的迫切需求。诚如宋臣苏辙所指：“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⑤故而，辽举国上下对于宋朝钱币非常重视。辽国建立之后，宋辽经济联系并未由于政权的并立而断绝，双方贸易往来反而日益频繁。货币的通用客观上成为维系宋辽政权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近几十年来，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巴林右旗、赤峰、林西、呼盟扎兰屯、伊盟乌审旗、兴安盟科右前旗以及山东省微山县、北京昌平区、辽宁省康平县、山西省浑源县等地区，辽代窖藏钱币多有出土和发现。关于辽国货币使用和流通问题的研究，学界观点诸多。契丹钱币研究专家卫月望曾指出，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宋以前的古钱和其他各类钱占20%多，而契丹自己所铸造的钱，确实是品种多、数量少。^⑥乔晓金认为，辽国普遍使用的通货是铜钱，并且已经进入了货币经济时期，确立了必要的货币制度。虽然也铸造有代表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是在商品经济流通中发挥主要交换媒介职能的货币依然是宋朝钱币或者其他中原王朝钱币。^⑦此外，俄罗斯学者别利亚耶夫、斯达诺维奇强调，由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1124—1218）铸造的续兴元宝与南宋绍兴元宝亦具有相关性。^⑧由此可见，西辽与南宋依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交流，宋朝的货币制度、货币文化无不深刻影响着辽国，宋钱在契丹政权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就辽国的货币流通和使用问题略作进一步阐述，冀为研究契丹政权的货币经济问题填一助尔。不周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出土窖藏所见辽国对于宋钱的不竭需求

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废除部落联盟制度，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建立了契丹奴隶制国家。由此而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早期的物物交换逐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遂之开始铸造钱币。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辽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流通的货币形态也表现得较为复杂。既有牲畜、皮张和布帛等实物货币，又有银两等称量货币；不仅有自铸的铜、铁、金、银钱币，而且有大量北宋及其前朝货币。总体而言，辽国货币主要分为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两类。前者包括牛、马、文皮（珍稀兽皮）和布帛；后者则包括金银称量货币（主要是北宋输入的金银）和金属铸币，铸币又可分为通货和非

① 《辽史》卷60《食货志下》，第935页。

② 李侠、晓峰编著：《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第21页。

③ 参见《资治通鉴》卷266《后梁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671页。

④ 《辽史》卷62《刑罚志下》，第943页。

⑤ [宋]苏辙：《栞城集》卷42《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7页。

⑥ 《契丹金融臆稿》，金融研究所金融史研究室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金融史文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史研究室1986年编印，第105页。

⑦ 乔晓金：《试论辽代的货币经济》，《中国钱币》1984年第1期。

⑧ 2008年11月，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克一别什姆（Aq-Beshim）出土数枚。阿克一别什姆，即唐朝古碎叶城（Suyab），其东南方有古契丹（Kidān, Qidān）人旧居住地，不时发现唐朝“开元通宝”和北宋钱（参见李铁生译《吉尔吉斯发现的“续兴元宝”与西辽年号考》，《中国钱币》2012年第1期）。

流通的年号钱、纪年钱、压胜钱、生肖钱、巡贴钱、瘞钱、契丹字钱、异文大钱等。^①

众所周知,契丹早期以畜牧业为主,商品贸易以物易物。建国之后,其经济、文化广受中原影响,商品贸易开始使用货币。辽太宗耶律德光取得燕云十六州,契丹与中原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更为频繁,尤其是“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之间榷场贸易达到鼎盛。然则,辽国钱币铸造数量稀少,解决不了如此庞大的货币流通需要。故而,辽国除积极增加货币铸造数量之外,还大量积聚和使用中原王朝铸造的钱币。^② 史载:“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瑁又献沿边所积钱,以备军实。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始铸乾亨新钱,钱用流布。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新旧互用。”^③近几十年来,窖藏在内蒙古、山东、山西、北京、河北等地区的辽代钱币被频频发现,其中一些大型窖藏清晰反映出辽国使用北宋钱币的状况,现举其要者列于表 1:

表 1 各地出土宋钱窖藏情况表

时间	地点	出土钱币窖藏情况
1972	内蒙古巴林左旗小辛庄	出土铜钱 140 斤,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44 枚。
1972	内蒙古巴林左旗小辛庄	出土钱币 560 斤,共 60 000 余枚。有汉、唐、五代、北宋和辽钱,共 47 个年号。宋钱居多,辽朝铜钱 44 枚,有 9 个年代 11 种。
1974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河县鄂卜坪村	出土钱币 250 斤,仅有辽钱 2 枚。
1978	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牛营子镇	出土铜钱 60 多公斤,主要为宋钱,辽钱只有清宁、大安数枚。
1980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村	出土钱币 47 斤,6 383 枚。唐钱占 22.5%,1 437 枚;宋钱占 77%,4 900 枚;辽钱仅有 8 枚,所占比例极小。
1981	内蒙古林西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	出土铜钱 777.5 公斤,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246 枚。
1981	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小城市乡三道营子村、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山村	出土钱币 1 910 斤,近 25 万枚。唐钱占 20.5%,宋钱占 78.47%,辽钱林西县 226 枚、巴林右旗 123 枚。
1981	内蒙古巴林左旗丰水山镇中号村	出土铜钱 637 枚,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1 枚。
1981	内蒙古包头市石拐矿区	出土钱币 5 公斤,547 枚,仅有辽钱 3 枚。
1982	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辉腾高勒村	出土铜钱 12 289 枚,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4 枚。
1982	吉林省九台县卡伦乡十里村	出土钱币 330 斤,31 180 枚,有少数辽钱。
1982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乡灰通河村	出土钱币 105 公斤,12 289 枚,仅有辽钱 4 枚。
1983	山西浑源县林场乡破兑白村	出土铜钱 1 875 枚,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1 枚。
1983	山西省浑源县林场乡破兑白村	出土钱币 16 斤,1 875 枚,仅有辽钱 1 枚。
1984	内蒙古察右前旗	出土铜钱 8 728 枚。中原各朝铸币占 99% 以上,且北宋钱币占绝大多数,辽代自铸钱币很少。
1985	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新建乡画匠渠	出土钱币 520 公斤,48 193 枚,仅有辽钱 2 枚。
1985	内蒙古呼盟扎兰屯	出土铜钱 19 公斤,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1 枚。
1986	山东微山县观城镇东田阵村	出土铜钱 104 公斤,主要为宋钱,仅有辽钱 1 枚。
1986	内蒙古伊盟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儿庙嘎查	出土钱币 860 斤,115 707 枚,仅有辽钱 23 枚。
1987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三道营乡榆树营村	出土钱币 175 公斤,1 795 枚,仅有辽钱 1 枚,下限为金代正隆元宝。
1987	辽宁省康平县西关屯乡边台子村	出土钱币 134 公斤,15 404 枚,仅有辽钱 6 枚,下限为金代正隆元宝。
1990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乡 8 号村	出土钱币 40 341 枚,仅有辽钱 4 枚,下限为清代道光通宝。
1991	辽宁省桓仁县二户来镇碑登村	出土钱币 400 公斤,有辽钱,下限为金代大定通宝。

① 《内蒙古金融志》编纂委员会编:《内蒙古金融志》(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2—43 页。

② 富占军、李兴胜:《察右前旗出土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辽史》卷 60《食货志下》,第 935 页。

续表

时间	地点	出土钱币窖藏情况
1992	辽宁省东沟县新农乡马圈子村	出土钱币640公斤,9173枚,仅有辽钱5枚。
1992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韩师训墓	出土铜钱62枚,共21种,除唐代开元通宝、十国的咸康通宝、开元通宝对钱外,其余均为北宋钱。
1994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巴彦琥硕村	出土钱币628枚,其中宋钱50枚,占总数量的83%。

资料来源:刘林海、孟令婧:《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代窖藏钱币》,《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乌盟文物站:《察右前旗出土钱币窖藏》,《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1期;徐永江、高伟:《昌黎发现辽代窖藏钱币》,《文物春秋》2008年第4期;孟建仁:《从兴安盟出土的几批辽代窖藏钱币谈辽代货币的发展》,《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第2期;田俊岭:《辽中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兼记2000年至2004年辽中出土的辽钱》,《中国钱币》2003年第5期。

兹后出土的辽代钱币窖藏情况更多,宋钱与辽钱之比例大致与表1所示相差不多。概而言之,在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山西等地区(原辽国故地或宋辽边界地区)发现的窖藏钱币中,宋朝钱币多有出土,数量占70%以上,辽代货币在数量上所占不足10%。因此,宋朝钱币外流辽国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使在辽中期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流通中的货币仍以外来钱为主,尤以宋朝货币为主,甚至连五代十国、日本、高丽、安南、西夏等所铸钱币并不禁止,都可以流通和使用。^① 辽国的铸币业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于货币的不竭需求。

三、辽国对于北宋钱币的重视及管理措施

辽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驽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湏酪,勉强射生,以给日用”。^② 然而至10世纪初,即五代时期,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设官立制、劝农商、教纺织,渐渐进入了货币经济的阶段。^③ 辽国最初使用的货币是由中原输入的,尽管也铸造有代表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是铜产量年额有限,质量也不好。道宗时期的清宁通宝,“径九分,重三铢”,很难同开元钱、宋钱相比。^④ 事实上,仅从货币铸造的精良与差劣、厚重与轻薄,就可以看到一个朝代政局的变化、国家与民族的强弱、文化水平的高低、社会经济发展的快慢以及财政收入的盈亏。^⑤ 所以,直至辽国末期,仍然存在着实物交换的贸易形式。

随着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发展,辽国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其原因有二:一是辽国境内铸币业相对落后。尽管辽国建立初期冶铸业已初具规模,但是为了满足契丹社会发展的需要,相较于钱币铸造而言,契丹政权更倾向于兵器以及各种生产、生活器物的铸造,如铜盂、碗、铜熨斗、壶、骨朵、刀、剑、灯、炉、马铃铛、马镫等,为数甚多。这些器物多系辽上京、中京、北安州、长春州墓葬中的物品。^⑥ 二是辽国境内多铁少铜,铸币材料匮乏。宋代北方仅占铜总产量不过百分之几,契丹草原以及契丹其他统治地区的铜冶和铜产量同样不多。^⑦ 加之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铜禁,并严禁私铸铜钱,致使铜铸币稀少。然而,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盛,特别是占有了渤海和燕云十六州之后,辽国的手工业受到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在征服了以善于冶铁的室韦人之后,契丹的冶铸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拥

① 卫月望:《契丹经济金融货币臆》,内蒙古自治区钱币学会编:《〈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2辑,呼和浩特:内蒙古金融研究编辑部2003年印刷,第48页。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页。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70—371页。

④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58页。

⑤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⑥ 张秀夫、田淑华、成长福:《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文物》1982年第7期。

⑦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76页。

有了更多专业的工匠,而且获得了大量的铁矿资源。^①

受制于铸币业相对落后和铸币材料匮乏的主客观因素,契丹政权对于北宋铜钱资源格外重视,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严禁销毁铜钱铸造器物和外流;二是通过贸易等手段大量吸纳宋钱入境,^②以此缓解契丹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货币的不竭需求,如宋臣司马光所言:“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③由此可见,经济上的联系和货币的通用,客观上加强了两个政权之间的交流。

四、北宋钱币外流辽国的途径与影响

辽国先于北宋建立,初期曾与中原和南方的五代十国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往来关系,实现了经济上频繁的财物转换和交流。^④北宋建立之后,作为邻国,宋辽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当密切,即使在双方军事的对抗期,民间走私贸易依然存在。北宋景德元年(1004)“澶渊之盟”的订立,虽然使官方榷场贸易成为常态,但是宋辽双方都颁布了相关法令来限制重要物资(即兵器、硫磺、铜钱、书籍及各种矿产等)的外流。在榷场贸易受限制的情况下,民间走私贸易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南北交流的畅通,满足了各族人民生活 and 生活的需要。因此,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都成为宋钱外流辽国的主要途径。此外,北宋每年源源不断输往辽国的岁币亦是宋钱外流辽国的源头之一。

首先,官方榷场贸易。北宋初年,宋辽已经在沿边互市,尤其是在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双方贸易又有了突出发展。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在北宋的镇、易、雄、霸、沧等州设置榷场。淳化二年(991),又在雄、霸、静戎军、代州雁门砦设置榷场。澶渊之盟的次年,辽先后在涿州新城、振武军及朔州南设置榷场;北宋在雄州、安肃军及广信军设置榷场,派遣官吏监督贸易。^⑤这些榷场开设的时间很长,“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⑥此外,短期设置的还有定州军城寨榷场、飞狐茭牙榷场及火山军、久良津等处。^⑦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民族和以辽国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在地区上分离对峙,但是在经济上却相互依存,这是促成双方榷场贸易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澶渊之盟缔结之前,从宋境输往辽国的有香药、犀、象及茶,后来又增加了苏木;澶渊之盟缔结之后,输往辽国的物品增加了缯帛、漆器、粳糯(粮食)及瓷器等物。^⑧随着宋辽两国贸易往来的频繁,从北宋输往辽国的商品又增加了铜、锡等,^⑨尤以茶叶、铜钱、瓷器等制成品为主。^⑩从辽国输往宋境的商品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其中羊的数量很大,^⑪“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⑫诚然,宋辽之间频繁的贸易交换往来满足了两国人民生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是宋钱外流辽国的主要途径。

其次,民间走私贸易。宋辽双方的官方榷场交易数量很大,但是远远未能满足普通民众的需要,所以在边境榷场贸易之外的走私贸易很发达。即使在军事对立期间,两国间的走私贸易依然屡禁不

① 张竞超:《契丹经济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第42—44页。

②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77页。

③ [宋]司马光:《宋朝诸臣奏议》卷138《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4页。

④ 田广林:《再论契丹社会货币经济的确立》,《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北方民族文化)》1998年第3期。

⑤ 参见张亮采《宋辽间的榷场贸易》,《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3期。

⑥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互市舶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63页。

⑦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7页。

⑧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互市舶法》,第4562页。

⑨ 熙宁二年,宋朝决定在北宋沿边榷场卖出铜锡。至熙宁七年,“北路有铜五十七万九千九百斤,锡九千八百九十斤,及市易,务于榷场卖铜皆百斤”。参见[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辛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32页。

⑩ 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⑪ 参见《宋史》卷186《食货志下·互市舶法》,第4562页。

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1,熙宁五年正月丁未条,第5136页。

绝。不仅陆上有这种贸易,甚至冲破海禁,宋京东路和两浙路的海舶泛海到辽国滨海地区贸易。如皇祐元年(1049),令“河北两地供输民毋得市马出城,犯者以违制论”;^①又如熙宁九年(1076),因边境上“私贩者众”,而“立与化外人私贸易罪偿法”,^②妄图斩断这种贸易联系。辽国同样如此,特别禁止向宋输出马匹,严禁“奸民鬻马于宋夏界”,并规定“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戮之,远配其家”,^③倘若“北界禁民粟马入我境,其法至死”。^④即使是可以贸易的物品,双方也互相限制。辽虽许可大批羊只出境,但“禁南京鬻牝羊出境”。^⑤然而,行政命令毕竟无法切断契丹与汉族千百年间形成的经济联系,相反,这种经济联系所具备的强大力量却能够冲破行政命令的束缚,使宋辽间的贸易越来越广泛地发展下去。^⑥在宋辽之间的走私贸易中,较为常见的物品主要有辽盐、粮食、书籍、马匹、铜钱和金、银、铁等金属、兵器、明矾等物。^⑦民间走私贸易是宋钱外流辽境无法控制的途径之一,客观上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联系。

最后,北宋的岁币、交聘等。澶渊之盟缔结之后,宋辽双方约定:辽主尊称宋帝为兄,宋帝尊称辽萧太后为叔母,两国以白河沟为界,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从景德二年到庆历二年(1042)的38年间,宋朝共向辽国提供银383万两、绢763万匹,折合当时的铜钱共1375.8万贯文(银价:每两银兑1贯600文;绢价:每匹1贯文);从庆历三年到宣和三年(1122)的79年里,宋朝共向辽国提供银1580万两,绢2370万匹,折合当时的铜钱共5451万贯文(银价:每两银兑1贯500文;绢价:每匹1贯300文),平均每年支付69万贯文的货物。综合计算,在北宋的117年里,宋朝共向辽国缴纳岁币银1963万两,绢3133万匹,折合为铜钱共6826.8万贯文。^⑧通过岁币这一途径,宋钱源源不断输往辽国,数量庞大,不可小觑。此外,宋辽间每年的交聘制度也是辽国从宋朝获得经济利益的方式之一。譬如,宋仁宗庆历年间,辽国遣使萧英等斡旋,并以军事压力相配合,获得“绢十万匹、银十万两”的经济利益。^⑨显然,北宋的岁币、交聘等亦是辽国获得宋钱的有效途径之一。

如上所述,辽国通过与北宋政权的榷场贸易、民间走私贸易以及岁币、交聘等途径获得了大批宋钱,客观上满足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源于此,宋钱成为辽代普遍使用的通货。^⑩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间,宋朝君臣谈及铜钱外流时讲到:“此外则两藩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⑪铜钱流于两藩,其中之一就是契丹,而且越到后来,流入契丹得越多,所谓“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费。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京师百官之饷,他日取牛羊于市者,惟以百货易之,近岁以痲疾、干没之为蠹,一切募民入钱,牵于京师,虽革刍牧之劳,而牛羊之来于外国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⑫又如前述宋钱外流至辽国早已有之,朝野上下对此也多有共识,并且将其和钱荒的发生相联系。故而得知,宋辽虽政权分立,但是在同一货币纽带因素的牵连下,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颇为密切。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7,皇祐元年九月己酉条,第4015页。

②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第4563页。

③ 《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第136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壬戌条,第188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二月甲寅条,第3748页。

⑤ 《辽史》卷4《太宗纪下》,第46页。

⑥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103页。

⑦ 方文速:《宋辽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第20—28页。

⑧ 朱瑞熙:《嚳城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页。

⑨ 贾玉英:《宋辽交聘制度论略》,《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⑩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99页。

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十一月己巳条,第1956页。

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8,熙宁十年六月壬寅条,第6929页。

五、结论

辽国行用北宋铜钱,盖为不争之史实。结合上文对各地出土辽国钱币窖藏的统计和研究得知,北宋钱币数量居多,约占窖藏总钱币数量的70%;唐代钱币次之,约占窖藏总钱币的20%;辽国钱币数量稀少,少则数枚,多则几十、数百枚。据此推知,辽国虽然也铸造代表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是在商品经济流通中发挥主要交换媒介职能的货币仍是宋钱和历代旧钱(包括契丹仿铸的各种钱币)。辽国虽自建国初期即已铸造钱币,但是局限于铜产量的严重不足,且自铸钱较少,“无论是年号钱、非年号钱、民俗钱都被赋予了政治、经济、文化象征的内涵,其作为政治、外交宣传工具的作用,远远大过经济的作用”。契丹皇帝不仅把契丹钱币看作促进贸易的通货,更主要的是作为对外政治宣传的工具。通过经济贸易往来,契丹钱大批流入中原,成为炫耀契丹国主权威的“王信”。^①因此,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契丹政权所使用的货币主要以宋钱为主。契丹政权一方面通过积极的经济贸易往来和政治、外交斗争获得大量宋钱,另一方面颁布法令严禁销毁铜钱铸造器物和外流。这些措施客观上满足了契丹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货币的不竭需求,同时也是宋钱大批北流辽境,加剧“钱荒”的客观因素之一,更是宋辽之间经济交往的重要纽带。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北宋具有向心力,亦是北宋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经济联系加强的体现。^②

Monetary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Seen from the Unearthed Coin Hoard

Li Zhipeng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ao dynasty, it is hostile to Song dynasty in politics and military, but it has a strong dependence on Song Dynasty in economy and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n the unearthed Liao Dynasty coin hoards, it is known that the majority of coins are the coins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total hoard coins. Tang Dynasty coin accounts for about 20% of the total hoard coins. The number of Liao dynasty coins is really limited, ranging from several coins to dozens or hundreds of coins. Accordingly,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although the Liao Dynasty cast coins representing the national regime, i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the currency which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medium of exchange is still the Song dynasty coin or other coins of Central Plains Dynasty. Therefore, the Liao Dynasty favored and put high emphasis on Song dynasty coin. In order to meet the inexhaustible demand for money, Liao has taken the promulgation of laws to prohibit coin resources outflow and seek more coins into the territory of Liao through the trade. Though the Song and Liao are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urren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lose econo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Dynasties under the same currency link.

Key Words: Coin Hoard; Song Dynasty Coin; Liao Dynasty Coin; Trade Contacts; Currency Exchange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方文速:《宋辽榷场贸易和走私贸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第13页。

② 杨富学、李志鹏:《北宋钱荒之西夏因素考析》,《西夏研究》2014年第1期。